

社会转型与史学的社会化

李传印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武汉 430074)

摘要:以改革开放为突破口和催化剂,我国社会正经历重大变化和转型,在社会变动过程中,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需要史学提供思考和回答。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来自史学的声音很微弱,甚至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失声了,史学在社会的变化中逐渐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史学与时代、史学与社会存在明显的疏离,史学发展少了些生机和活力。我们认为史学应该正视和适应当今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因时而变,既不抱残守缺,也不附势媚俗,在保持史学独立学术品格的前提下,通过史学的社会化过程,积极主动地在社会的变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时代使命,并对社会变化和转型做出具有历史深度的思考和回应。

关键词:社会转型;史学社会化;史学变革;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3-0046-07

近30年来,以改革开放为突破口和催化剂,我国正经历社会的重大转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全新面貌,这些变化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极大关注和讨论。世变方殷之日,正是史学变化之时^{[1]3}。面对当今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史学应该积极主动地在社会的变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时代使命,并对这些社会变化做出具有历史深度的思考和回应。遗憾的是,在这火热的社会转型中,很少听到来自史学的声音,史学与时代、史学与社会存在明显疏离。一方面,史学家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越来越琐碎和精细,对时代和社会急需回答的现实问题缺乏思考热情,冷眼旁观;另一方面,史学日渐被社会冷落,被时代边缘化,被社会大众敬而远之,史学发展少了些生机和活力。历史学是否需要正视和适应社会转型,是否需要因时而变,以满足新时代对史学提出的新要求,这是当今史学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就社会转型时期史学的社会化变革问

题略抒浅见。

一 重视社会转型对史学变革的要求

虽然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来认识和分析当今社会的变化和转型,但我们认为,这些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发财原则”与历史沉淀下来的“道德原则”在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全面冲突,这种冲突在现实层面演变为社会的深刻变革。

仅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看,传统的原典诵读被网络碎片化信息撕裂,对人生和社会的深沉思考日渐被娱乐的笑声挤占,社会不再青睐枯燥单调和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更欢迎那些能直接产生效益和创造财富的技术和文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把能否赚钱作为衡量事物唯一的价值尺度,社会已步入了一个“反文化时期”,不能赚钱的“文化”受到社会的轻蔑。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社会是一种新形态的“反智社会”。而中国历史文化的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重义轻利”,传统史学对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始终表现

收稿日期:2016-01-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研究”(15YJA770008)。

作者简介:李传印(1964—),男,安徽太湖人,历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

出极大的尊崇和维护。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文献，对资治鉴戒和道德教化的宣扬远远超过对人们现实利益的认真分析，传统史学的这种价值取向与当今追名求利的价值追求不相契合。传统史学在这些奔走于功名利禄之间的人眼里是无用之学，是迂腐之学，是名副其实的“死”学。客观地说，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传统史学与目前这个以功利为导向、极端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传统史学的社会地位不可避免地沉落。

虽然一些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变化感到困惑和担忧，也在为扭转“时弊”进行着不懈努力，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史学工作彰善瘅恶，收拾人心，重建符合传统道德和价值的社会秩序，但客观上说，史学界的这些呼吁和努力效果微弱。不管我们对当今社会的变化持何种看法和态度，社会转型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其过程虽然可能很漫长、很艰难。面对不可阻挡的社会转型，历史学是消极逃避、麻木漠视、强烈抵制，还是自我更新、积极应对、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史学的“危机”主要是由社会造成的，而这个社会又处于非常时期，一旦社会走上正轨，恢复常态，即社会转型完成之后，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提供充分的条件。基于此，很多人乐观预测和期望，历史学在社会转型期基本完成后一定会拥有大量的社会需求，到那时，历史学仍然是“显学”，重新占据“学界老大”的地位^[2]。故此，历史学可以先躲进小楼，远离红尘，以不变应万变。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这次社会大转型完成后，将来的社会与传统的社会已大不一样，与当下的社会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社会对史学一定会提出与传统和现在不同的新的要求。

客观上说，当今史学界相当多的人对社会转型持一种观望、等待、保守的态度，有怨声载道者，有杞人忧天者，还有愤愤不平者，在他们的意识里，历史学就应该而且只能受到政治和社会的重视，而不能接受开放社会的冷遇。历史学似乎有诸多理由质问社会为什么不重视自己，但社会则更有理由质问历史学究竟对社会有什么用处。我们认为，历史学不应该消极地对待社会转型，而应该锐意变革，积极地参与到社会转型中，主动思考时代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在社会的转型和新社会建构中发挥自身应有的引导作用，只有这样，史学才能重新获得社会的接

受、尊重和信赖。

我国传统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其中，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的是，我国传统史学是个开放的学术系统，从来不僵化保守。面对社会的变化，我国传统史学能够积极主动回应和思考社会变化，并形成史学发展与社会变化双向互动的关系。春秋时期，礼乐崩坏，旧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诸侯兼并，四夷交侵，干戈扰攘。孔子面对变动的世界，重新撰写鲁国历史，创立春秋笔法，“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3]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孔子一方面对社会的变化做出主动回应，另一方面也通过《春秋》义法为社会发展树立一套价值标准，引导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发挥史学应有的社会作用。秦汉时期，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面对这种大一统局面，司马迁综合前代编年、记事、记言、记谱等多种史书体裁，撰写纪传体通史著作《史记》，以“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既适应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也以史学的观念形式固化天下一统的历史趋势。西汉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错综交织，大一统的格局被打破，西汉灭亡，东汉继起，社会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又恢复了宁静。劫后余生的人们人心思汉，人心思安，班彪、班昭、班固父子兄妹为谋求社会安定，站在“王命论”的政治立场上，撰写《汉书》，以纪传体断代史体例，宣扬汉承尧运，颂扬刘氏汉室顺天应人。仅从孔子、司马迁、班固来看，他们面对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呼声，没有作壁上观，因循守旧，也没有惊惶失措，而是以史家独特的心智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进行积极观察和思考，并提出自己对社会变化的价值引导和方向指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世界各个方面都在变化，逐步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英国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撰写的《极端的年代——1914至1991年》(上、下)全面阐述了20世纪世界的变化。相对而言，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社会的变化更加敏感，也率先回应这些变化，并在与社会变化的互动中实现自我革新。而此时的西方史学对社会变化的反应稍显迟缓，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家们仍然埋头于史料的搜集、考证，史学面临被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化程度较高的学科视为素材

提供者的尴尬窘境。但是,一些历史学者也捕捉到时代变化的气息,把眼光从发黄的档案、日记、书信上转移到对人自身的观察和思考,把编年史和政治史陈旧的价值取向转换为更具开放性的民主化取向和更宽泛的人文关怀之后,史学焕发了新的生机。卡尔·兰普勒希特出版了《文化史方法论》,提出用新型文化史写作来对人类历史进行整体研究。1912年,鲁滨逊将他的八篇论文结集出版,并命名为《新史学》,通过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对史学革命的极力宣扬,以回应20世纪初人类社会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交通、通讯的发展,使人类交往的时空限制越来越小,不同文化彼此交融渗透,这是世界的新变化。年鉴学派顺势提出“整体历史”和“历史综合”口号,既借鉴和引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借鉴和引进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学、精神分析学、经济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理论被积极主动地引入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社会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理史学、数量史学、口述史学也蓬勃发展,史学积极主动与其他社会科学交流、融合,呈现出整体化和综合性的发展趋势,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使古老的历史学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

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注意到每一次社会的重大变革都会对史学提出新的要求,而史家则会自觉或不自觉根据社会的要求对史学的发展做出反思和变革,从而使史学发展与社会需要协调一致。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促使孔子对史学的深刻思考,创造了“春秋笔法”;秦汉之际的社会变革,激发司马迁对于通史撰述的重视和历史盛衰的考察;近代以来的社会变化,使梁启超对“旧史学”进行系统批判,鼓吹史界革命,高扬起新史学的大旗。面对社会的变革,孔子、司马迁、梁启超不是静坐不动、消极抵制,而是主动地革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以变革的史学引导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

当下我国也正处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许多现实问题和时代困境需要史学提供历史阐释和回答。在这样的境遇下,史学有必要在不损害自身学术品格的前提下,勇敢地接受时代的挑战和呼唤,既坚守资治与鉴戒的价值系统,也遵循求真与致用的史学原则,又适时地对传统史学进行恰当的现代转换,赋予史学新的时代意义,凸显史学的人文关怀性

和现实导向下的探索精神,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在对社会变化的思考和回应中彰显史学的价值,既推动史学自身发展,也在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中找寻到自身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

二 从下层民众的视角看待历史,塑造史学平民化性格

史学如何在社会的发展中找寻到自身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呢?从历史经验看,史学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动力在于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回应,除为统治者与学者文人提供资治鉴戒的历史智慧外,史学也要关心社会大众的现实关切。如何构建史学与社会的良好互动关系,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与传统社会不同,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性社会。若从社会结构方面看,当前社会转型呈现出社会结构多层化、思想文化大众化、文化需求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维化的基本特征。这种社会变化和社会转型反映到社会对史学的要求上,就是史学应该通过社会化过程,关注历史知识受众的层次性和差异性,使史学不是少数人的学问,而是被社会大众认可并乐于接受的学问。史学在关注社会的变化和各种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应该主动走出高墙深院,真正融入到社会生活中,为社会提供丰富多彩的史学产品,以满足多层次、多元性、大众化的社会需求。这样才能构建起史学与社会良好的互动关系,并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身的社会位置。

大体而言,史学的社会需求主要分为专家学者的学术需求、治国安邦者的历史智慧需求和普通社会大众的历史教育需求三个基本层次。传统史学在满足专家学者的学术需求方面做得很好,树立了直书观念、实录观念和信史观念,努力撰述信史,尽力复原和重构历史的本相。而《资治通鉴》把史学的资治鉴戒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并成为史学典范。史家通过发掘蕴含在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政治家和各类社会管理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智慧。在这两个需求层面上,传统史学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动力,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国传统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虽然重心逐渐下移,不断将社会大众纳入历史知识传播对象和受众范围^[4],也产生了宋代“说史”这样深受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史学形式。但总体而言,传统史学主要还是以政治家、思想家等精英阶层、专家学者作为主要

受众对象,忽视了史学受众的层次性和多元性。当今社会结构处于复杂的变动之中,史学要走向社会,就必须较准确地区分社会对史学的不同需求,较好地把握这些不同需求所要求的史学内容、史学形式,并针对不同的社会需求提供不同的史学产品。我们认为,当下史学发展在继承传统史学撰写信史和资治鉴戒的基础上,要重视史学平民化性格的塑造,与多元形态的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并形成双向互动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般社会大众,如田间耕作的农民、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等,对那些艰深晦涩的历史论著,他们读不通、看不懂。他们对严密的历史考据不感兴趣,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用不着,他们关心的是人文关怀和活生生的生活感受。因此,我们认为史学平民性格的塑造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适当转换观察角度和立场,从下层民众的视角看待历史。以求真致用和资治鉴戒为目的的正统史学,宣扬大传统的历史观念,它高居庙堂之上,深处经院之中,以求真求实为出发点,以政治需要和经世致用为归宿,说的都是一些大道理。而社会大众希望史学从下层民众的视角看待历史,观察历史,叙述和解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的人文关怀和生活感受,分析历史人物的人生经验和人生体悟,充分体现史学的小传统,比较真切地反映下层民众的历史观念。史学既要宣扬高大上的大道理,也要满足下层民众借鉴历史人物人生经验方面的史学需求。

其次,更新史学观念,正视社会大众对于史学的娱情需要,形成平民化的“人生史鉴”思想。传统史学重在资治鉴戒和道德教化,把史学鉴戒、垂训和教化作用视为史学的生命。当今社会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和社会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因此,史学应该尊重平民大众阶层对于史学的娱情需要和个体人生借鉴需要。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在抨击“旧史学”为帝王服务时就指出:“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5]8}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也认为:“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接,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6]74}显然,梁启超、李大钊都把人生的变迁和民众生活的历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以人本主义的史学作为治学和著述的理想之

一。100多年过去了,当今史学工作者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旧史学的羁绊,更多关注的是历史上那些大事变、大人物,说的都是治国安邦、彰善瘅恶之类的大道理,有时甚至为了政治需要和现实利益不惜进行影射比附,使史学严肃有余而鲜活不足,远离了平民大众。我们注意到,现代社会相对传统社会而言,在文化方面虽然也关注上层社会生活,但更关注平民大众的公众生活。为适应社会的这一变化,史学应该适当调整研究定位和研究视角,多关注普通人的思想和生活,史学应该有大众性和普适性,平民大众所需要的增智、悦神、娱情都应该成为史学的目标。史学既讲三皇五帝、名君贤臣,也说草莽英雄。只有这样,史学才不是单一的政治教本和伦理教科书。在这些方面,西方史学工作者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史景迁《王氏妇人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的历史命运》、孔飞力《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叫魂》等,既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又具有较强的通俗性、故事性,既推动了专业化的史学研究走向深入,又为非历史专业的平民大众所认可。

其三,革新史学形式,淡化史学的“贵族”气息,凸显史学的社会化和平民化特征。在许多人眼里,史学是“名山”事业,是“载道”之器,是“精英”之学。但是,当今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社会大众的知识文化得到普及和提升,各种信息传播媒体为平民大众所掌握,政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平民大众都积极参与,平民大众具有重要的社会参与度,在一定意义上说,谁忽视了平民大众,谁就失去历史机遇。因此,史学也应该革新史学形式,在不损害史学学术品格的前提下,逐渐淡化史学的“贵族”气息,不断拓展史学的社会化的形式,使史学内容通俗又不失典雅,史学的研究和创作队伍既有专家学者也有草根平民,史学传播既有学校课堂也有报刊杂志、电视电影和各种新媒体,历史教育方式既有严肃认真的说教也有生活化的慢慢熏陶。

史学的社会化和平民化特征的养成,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革新历史著作撰写的体裁体例,改变千人一面的历史撰述风格,少点八股味,多点人情味,提供不同撰述风格且为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史学产品。二是在历史叙事方面适当进行文学化、通俗化改造,少些空洞说教,多些鲜活的历史人物分析。传统史学重在求真求实,反对历史叙事的文学化倾向,把历史变化的因果分析作为史学

的重点。而平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不在于历史因果关系的认识 and 了解,而在于历史人物人生过程否泰变化、轶闻趣事、心理活动和神态描述。因此,史学适当的文学化、通俗化是赢得社会大众的必要手段。三是历史叙述和表达的语言要打破传统精英话语系统的主导地位,正确运用现代话语甚至是网络语言,对晦涩的史料进行“转译”,使历史话语贴近生活,贴近平民大众,让平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便于社会大众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接受。四是重视现代媒体对于史学的传播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大众接受知识的途径和方法更加多元,学校课堂、经院讲堂已经不是历史知识传播的唯一途径。因此,史学要有充分自信,敢于把学术与媒体对接,打破学术与媒介的隔阂,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手段,最大限度地接近社会大众、深入社会大众。否则,史学就会被已熟练掌握现代信息传播媒体的社会大众冷落甚至抛弃。

在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专家学者对历史本相的还原、重构和对历史价值的挖掘,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将永远停留在猜测层面上,历史理性无法建立,民族的素质无法提高;如果没有政治家对于历史智慧的鉴戒需要,历史存在就失去发展的活力;如果没有社会大众对于历史生活化的需求,历史就会躺在故纸堆里沉睡发黄,失去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史学应该在正确区分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史学需求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平民大众的史学需求,养成史学的平民性格,将史学发展扎根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中。

三 贴近大众,夺回历史知识传播的话语权

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隐性认识,即学校的讲台上或学术会议的主席台才是发布史学研究成果和传播历史知识的阵地,只有相关专家学者才能读得懂的论著才是学问,只有满纸之乎者也等晦涩难懂的语言才受人敬重。不知不觉中,史学成了“贵族”学问,远离大众,远离生活,忽视了一般社会大众的史学需求,漠视了社会大众通俗而不失雅致的史学需求形式,以至于嗜利的商业资本趁虚而入。在一些影视剧中,我国历史遭到“戏说”,悲壮的八年抗日战争被拍成了一幕幕无厘头的“抗日神剧”,引起了史学工作者严重不满和深切隐忧。一些人对中国历史的任意“戏说”,就是向全体国民尤其是青少年传播错误的历史知识,宣扬错误

的历史观,甚至是非颠倒,模糊历史上的忠奸善恶界限,隐没人性中的善根善意,激发出人性中的邪恶因子,后果令人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场热闹的历史“戏说”中,史学界基本上失去了话语控制权,许多史学工作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又束手无策。

虽然“戏说”历史之风早已激起史学界的公愤,但许多史学工作者乐于躲在斗室书斋里,埋头寻章摘句,专心考据、校勘,虽然取得了很大学术成就,但观念依然陈旧,方法依然老套,习惯于把史学研究和历史认识写成严肃的学术论著,或在历史学者之间传播,或藏之名山,曲高和寡的史学成果无心也无力对戏说历史的不良倾向做出有力回应和反击,无法控制社会对于历史需要的话语权。虽然也有一些史学工作者对于史学界失去话语权忧心忡忡,并做出了许多努力。他们一方面对随意戏说提出批评,另一方面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希望通过自己对历史的“正说”来拯救时弊。从目前情况看,史学界并没有夺回失去的话语权,“戏说”历史之风仍在蔓延,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念仍在腐蚀国民的心灵。史学界为什么失去了历史知识传播的话语权,又如何夺回这些失去的话语权?这是一个值得从不同角度深刻思考的理论问题。

其一,传统史学的内在价值取向与当下社会的功利价值取向不协调。传统史学既求真,更求善;史家虽然追求撰述信史,主张实录,但又认为“彰善癉恶”才是实录的根本目的所在^[7]卷六十四《柳虬传》。传统史家所说的实录并非历史本相,而是依照儒家标准而呈现的善事恶行,这与近现代史学以保存客观史实、科学认知历史的治史目的和客观理性要求并非同义。简而言之,传统史学追求的是历史中蕴含的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传统史学紧密依附于政治,其价值取向局限于具有一定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的阶层。而政治民主化、知识大众化、生活物质化才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现代社会的人们在读史求善、以史鉴今的同时,更希望从历史中获得竞争意识和能力,获得精神的放松和愉悦。鉴此,我们不能谴责当代社会的功利和物质化倾向,更不能按照传统史学的价值要求把现代社会拉回古代和中世纪,而只能对传统史学的价值取向进行拓展和转换,即将传统史学所追求的相对狭隘的政治价值与道德价值拓展为以人本主义为根基的人文关怀,使史学的价值与当今社会人们的需求在一定范围内契合。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之新,不仅在于史学研究方法之新、史学理论之新,更在于对于史学价值认识的更新。在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其全新的价值观念赢得了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认可,并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引领时代发展方向。

其次,传统史学的历史叙述方式不合当今人们的口味。传统史学中虽然不乏《史记》那样学术性和思想性兼备的历史著作,而且其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历史叙述方式也得到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所有人的一致肯定和称赞。无庸讳言,我国传统史学中像《史记》这样得到全社会认可的历史撰述并不多,史家历史撰述过程中所使用的历史叙述方式不同程度呈现出历史分析简单化、脸谱化,历史解释教条化、机械化,历史叙述语言呆板、晦涩,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历史叙述的形式八股文风浓烈,让人见而生厌。在对历史知识受众的争夺中,以探索历史规律为己任、追求高深学术含量的史学,败给了那些“戏说”历史的各种媒体。如果我们不转变传统史学那种呆板、酸腐的历史叙述方式,就很难把社会大众从“戏说”的电视、电脑屏幕前拉回到史学工作者面前和史学讲堂里。

史学是人文学科,虽然史学研究只能是一部分专家学者的事业,但史学研究的成果不能是少数人的自我收藏品,不能是只供少数人玩赏的东西,而应该把史学研究的成果投向社会,走向民众。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史学的作用和价值。将史学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和民众的关键,就是史学的“通俗化”之路^[8]。只有通过转变历史叙述方式,实现历史研究的“通俗化”,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搭建一条通向历史的通道,使久远的历史事件鲜活地呈现到当代社会人们的面前,让人们不再感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那样的遥远,那样的难以理解,史学才能赢得社会大众,赢得历史知识传播的话语权。

其三,传统史学传播途径的封闭性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不适应。传统史学对于史学研究成果和历史知识传播虽然很重视,但传播途径较为简单。一是重视历史文本的详细诵读;二是强调师生之间口耳相传相授;三是把历史研究成果的发布局限在课堂、讲堂和各类学术会议、学术刊物上。这种历史研究成果和历史知识的传播方法和途径呈现出较明显的封闭性和半封闭性。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颠覆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方法,使现代社会表

现出信息互联性和开放性特点。图书馆、课堂、讲堂之外的各类媒体成为历史知识传播的重要平台。在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社会谁掌握了电视、电脑等传统媒体和新兴的QQ、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谁就掌握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因此,史学应该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在坚守图书馆、课堂、讲堂等史学阵地的同时,勇敢地走上电视、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使史学走出经院,面向社会大众,以史学严肃审慎的学术品格,以生动活泼的历史叙述形式,以人们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占据史学成果发布和历史知识传播的主渠道、主阵地,重新掌握历史知识传播的话语权。

毫无疑问,面对社会的转型,史学如果无视社会的变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结果只能是史学被社会更深的冷落和抛弃。史学应有的态度是正视和主动适应社会的变化,积极调整与社会的关系,通过自身的变革,通过史学的社会化过程,使史学发展踩上时代的节拍,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保持与社会发展的步调一致,并在自我革新中,重新找回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在社会转型中谋求自身的变革和发展,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自封,也不迷失。我们认为,在史学社会化过程中,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化是史学根据时代变化而进行的现代转换,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遗产要很好继承和弘扬,同时,也要对这些优秀的史学遗产进行适当的价值更新,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体系,使传统史学保持生命力。比如,注重历史撰述的当世意义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在近代社会里,这一优良传统被史家片面追求客观理性的史学研究目标取向遮蔽了,使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时代感、现实感。虽然传统史学在注重当世意义方面强调的是较为狭隘的资治和道德伦理价值,但重视史学当世意义的传统理念需要继承和发扬,因为这是纠正史学脱离时代、脱离社会弊端的有效方法。只有史学重视当下意义,才能促使史学工作者关心时代,关注社会,思考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保持史学与社会密切关系。

其次,处理好求真与致用的关系。史学是一门严肃、严谨的科学,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与学术操守,理性、客观、严谨、求真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

但是,史学最终还要回归社会,致用于社会。司马迁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撰《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重在考前世兴衰、当今得失,为宋神宗治国安邦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因此,史学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关注社会并不是媚俗,思考现实问题并不是附势,回应时代呼唤并不是比附和影射,在任何情况下,史学独立的学术品格都不能受到损害。因为史学需要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各种新媒体,养成史学平民品格,但史家要时刻保持史学的学术品格和科学操守。

其三,处理好学科独立性与学科交叉的关系。

史学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打破学科壁垒,善于借用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学科交叉,拓展史学研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这是当今史学变革的动力和重要方向。但是,在这种学科交叉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史学不能失去学科的独立性而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属物和注解体。史学在与其他学科交叉互融过程中保持学科独立性的原则,就是对于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吸收和借用不能超脱史学的学科规范,避免因为过分强调学科交叉而导致史学本体地位的迷失。

参考文献:

- [1] 逯耀东. 魏晋史学及其他[M]. 台北: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8.
- [2] 雷戈. 社会转型与史学变革[J]. 学术月刊, 1997, (1): 119-124.
-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4] 李小树. 中国史学的雅俗分流与俗史学的复兴[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 (2): 115-121.
- [5]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6] 李大钊. 史学要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7]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8] 杨淑明. 由“易中天现象”引发的思考[J]. 潍坊学院学报, 2007, (1): 60-63.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LI Chuan-yin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Our society is experiencing significant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this process, many realistic issues need to be settled with the help of historiography. However, the voice of historiography is very weak or even speechless on many major issues. Historiography have gradually lost its due position with the deep gap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time, historiography and society. Its development lacks vitality and energy. This paper holds that historiography should face up to and adapt itself to social changes, changing with times, neither conservative nor submitting to the power. Through its socialization, historiography should keep its independent academic character, actively find out and bear the mission of the era, thus make a in-depth response to social chang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change; historical theory

[责任编辑:凌兴珍]